

京剧电视剧的“她世纪”

——有感于“梅兰芳金奖”得主郭跃进和她的“飞天奖”《余赛花》

戴谨忆

“杨家将”中余赛花(余老太君)故事最早产生于民间,主要有评书、小说和戏曲等几种表现方式,内容大多是余赛花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事迹。在封建社会中,杨家将题材的忠孝观念符合了家国臣君的道德规范,因此受到上层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尤体现为慈禧钦定的清代宫廷戏《昭代箫韶》(北宋杨家将故事)。但一代有一代之精神,亦有一代独到之文化内涵,诞生于2007年的第26届“飞天奖”——八集京剧电视连续剧《余赛花》(后面简称《余》),为山东省历届电视剧参选“飞天奖”中的首部获奖的京剧创新作品,全国高校范围内第一部创作并获奖的京剧电视连续剧,为山东的京剧创新作品开创先河,成为全国高校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开发的一项丰硕成果,使“飞天奖”从此打上“学院造”品牌的印迹,这在全国高校中尚属首例。

时至2010年的今天,女性意识从萌芽状态进入成长壮大阶段,在全球政界中已有近20位女总统(女总理),商业、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女性更是人才济济,关于“她”的话题开始风靡。于是人们惊讶的发现21世纪生活正在向“她世纪”转变。《余》剧制片人、领衔主演郭跃进(全国京剧最高奖——“梅兰芳金奖”获得者,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饰余赛花)把握时代脉动,凭借女性独特视角对社会历史的重新审视,借助母亲形象的时代化表现,成功地开创女性视角京剧电视剧的“新纪元”,用实力不断刷新央视播出记录(央视一年内播出11次),用全新思维阐释“她世纪”的时代精神,最终形成一股“余赛花”洪流,引领京剧电视创作的时代方向。

一、女性视角对社会历史的重新审视

早在2005年《余》剧创作之初,制片人郭跃进就对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一是如何将京剧特质与视听艺术进行有机结合;二是如何拿捏历史感与现代性的分寸。在这种指导方向下,该剧在拍摄过程中,紧紧把握住“不盲目拔高历史人物,不把历史人物当作传声筒”,重点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强烈的现代意识,厚重的历史载体,重新定位传奇人物余赛花,力求并通过余赛花个体女性形象展现“集体女性”的命运和价值,抒发21世纪“她视角”下女性与历史。

现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作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很少出现在京剧电视剧中。传统京剧老旦戏《钓金龟》、《望儿楼》、《遇皇后》、《打龙袍》、《赤桑镇》到现代京剧电视剧《余赛花》,女性形象由封建奴性、逆来顺受到独立自主、巾帼不让须眉变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文化、社会的逐步开放,艺术工

作者在作品中成功地捕捉到女性意识萌芽的气息,力求思维意识的与时俱进,把个体生活带入艺术,以女性视角重新看待生活。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的那句“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无懈可击地解决问题,而在于促进人们热爱丰富的永不枯竭的生活”。

《余》剧中女性(余赛花)对历史的审视包括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权衡。历史真实包括余赛花身份记载的历史事实、语境、细节等;艺术真实是指余赛花人物形象在历史真实基础上夸张塑造的荧幕想象。《余》剧选取宋王、金王、西夏王等封建集团割据纷争的真实历史,将人物和时代、战争与归属、宏大主题与人性私语等主题都放在其中,借助女性(余赛花)的反思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夸张合二为一,借助女性个体对“何为家?何为国?”、“为家卫国,是舍是得?”等问题的原生态视角还原、社会形态的再认识,反映出“人性、情感、历史、真实”等词汇,反思战争硝烟背后人性的迷失与无奈,符合当今社会人们希望和平的主流审美。

二、母亲形象的时代化表现

《余》剧通过“母亲”形象的隐性叙事结构,在故事中强化情节的整体连贯性和结构的内在逻辑性,注重“情感”的设置和横向场景的描绘。余赛花作为一个传统的女性,接受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但是本剧的亮点却通过历史人物的“间离化”表演给立体体现出来。该剧虽提炼“杨家将”中关于余赛花的民间素材,但对余赛花的一生,但却不是简单地加以剪裁编排,而是根据京剧电视剧艺术特质和表现的需要,对“母亲”形象进行符号化的提炼,向女性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的纵深处开掘,使故事更为精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余赛花“母亲”这一形象在“杨家将”系列的小说和戏曲舞台上一直被认为是忠义和无私的化身。特别是戏曲舞台演出中,由于受时空限制,余赛花大多出现在折子戏或连台本戏的片断中,没有一个独立完整的女性定位,也无法达到“母亲”叙事核心,而京剧电视剧《余》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余赛花的人物分几个时间段体现:武艺高强的如花少女(力量母亲的潜质)、杨家小将的母亲(传承力量的母亲)、舍小家为国家的祖母(引导定位的母亲)、巾帼不让须眉的守望者(国家的母亲)。让观众清晰地看到新的女性京剧在蹒跚中重新起步,从一种反传统(女性婚姻、恋爱、家庭和社会价值)的女性意识入手,思考女性、母性、主体性等。这在男性视域一统文艺界的情形下,发出了母亲自己的声音,复原了女人

· 评 赏 ·

作为母亲真实的面容,这就放大了余赛花内心矛盾斗争的内核,从人性的深层次纵向拓展了观众的审美纬度。如该剧最后的“太君辞朝”一场,为表现余赛花卸甲归田、怀抱灵位的老母亲形象,影片画面运用微仰视角,声音方面力求静默,营造“大音希声,大悲无恸”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随着氤氲开来的无言痛楚,人物内心“悲情”得到彰显,母性的博大背后的隐忍与无私也得到了最大释放。

思想意识上的彻底革命是需要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下慢慢进行的,以女性视角重新审视“母亲”这一符号也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对传统思想理解与改革中不断的探索。每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的经验都是可贵的,都具有分析研究和参考资料的价值。对待《余》剧中“母亲”的时代立意,评论家曾有过着这样一句话:“京剧电视剧能拍得这么贴近时代,这么好看!实属难得!”

三、女性视角开创京剧电视剧的“新纪元”

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这一视域主要建基于盖尔·塔奇曼的“反映假设”理论。其主要观点认为,为尽可能吸引多的受众,大众传媒必须选择反映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标准,将社会状况加以象征性的表现。因此,《余》剧在表现女性形象时,顺应当代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代表着迅速变革的中国社会中女性政治力量的崛起京剧艺术创作,其真实的意图是将传统的“宏大叙事”与“个体话语”潜在的对抗改创为两者的有机融合。

传统的京剧电视剧中,女性是置于庞大的男性社会统治中的,女性的命运也是自己无法控制的。在对“新世纪”女性主义研究中发现,女性被“刻板的”归纳为肉体的、非理性的、付出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男性则被定义为精神的、理性的、享有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维的。现在市场上很多京剧题材是延续传统对于性别角色“象征化”符号的运用,女性被弱势和边缘化,女性意识的表达几近于无。面对这种状况,以前的京剧电视剧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女性形象还不能完全承担起女性意识和追求的重任。

《余》剧一改传统,大刀阔斧进行创作改革,在拍摄中有

意识地对女性情感、故事情节进行丰富完善,改变以往京剧电视剧“照搬”和“话剧加唱”得形式,改变传统京剧“三大件”为主的伴奏配置凸显“京剧交响音乐”,将电视剧“特写”逼真与京剧“写意”程式结合,形成气势宏伟的“史诗”风格,开创“大写意”的电视化叙事。为调整电视叙事节奏,保持京剧唱腔完整性,剧中用视听手法外化了余赛花出嫁前后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三个阶段的内心世界,角色的跨度让表演者唱腔也从“花旦”到“青衣”再到“老旦”,这不仅从结构上使作品更加完整,而且丰富了余赛花人物性格,从“松林巧遇”到最后的“解甲归田”立体展现出她的亲情、爱情和母性,层次鲜明,过渡自然,为观众再现一个女性意识的觉醒的过程。正是这种大胆突破的艺术手法,才有后来的剧情中的余赛花巾帼沙场,屡立奇功;也正是这种觉醒,余赛花才在识破对方计谋后不甘礼教压抑,据理力争。这一切,都暗合了新世纪电视创作中情节的是非曲折、人物宿命早有性格据决定的主题。

打破传统京剧电视剧相对封闭的“摄影棚艺术”,采用横店影视城实景拍摄;“她视角”的京剧艺术的新突破,最终形成京剧发展史中里程碑式的电视作品;紧扣时代文化产业的脉搏,让女性在京剧电视剧中形成自己文化特色;艺术实践上另辟蹊径,探索出产学研一条路的精品创作并形成文化衍生……。面对这些溢美之辞,制片人、主演郭跃进淡然一笑:“心有振兴京剧的‘责任’,用挚诚的‘心’来制作电视剧,用‘心’去紧扣时代脉搏,做到这些,才仅仅是一部优秀作品的起点……”。

话虽简洁,却一语中的。再次闪回到2007年第26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获奖的画面,这一年的“飞天奖”首次将传统一年一评体制改为两年一评,全国参评电视剧作品共有151部(3432集),要想脱颖而出,难度空前之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余》获得成功,而且是完美的胜出,轻松而潇洒。我突然想起我以前看的一本书里面的那句话“有许多戏,人物事件都是虚构的,但是只要能反映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与时代特征,就仍然不失为一出较好的历史剧。”或许,这就是艺术上的同一层境界吧。

(作者: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接第94页)戏剧梅花奖演员加盟出演。其中主演贾文龙因出演李天成这一角色而荣登第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此外,饰演丁秀莲、巧巧、二梅的汪圣珍、杨红霞和张春玲也都曾荣获梅花奖。他们精湛的技艺,完美的做功,富有地方特色的唱腔,成为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无丑不成书”,丑角的插科打诨是戏剧的魅力所在,豫剧现代戏名丑陈珉珉饰演的“三娃”这个形象对剧情进行穿插,起到了调节气氛的作用,整个故事也活起来了。所以,优秀的演员也是该剧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全剧,之所以能受到观众的高度好评,我认为关键在于此剧所反映出真切的农村生活。众所周知,“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难题,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脱贫致富和共同奔小康,是当今农村发展的重要问题。全剧准确把握时代精神,戏剧冲突激烈、人物情感真切生动、思想意蕴浓

厚,以“三农”问题为切入点,成功塑造了一个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基层干部形象,较好地演绎了主人公李天成在困难面前所表现出的高尚思想,以及在为人处事中展现出璀璨的人格光辉。生动真实故事情节,给人以振奋鼓舞,深深打动了全场的观众,可见这部作品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广大的中国农村,怎样才能走上脱贫致富的路?《村官李天成》或许指明了农村发家致富的一条出路,同时也对农村现实生活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村官李天成》作为现实生活题材作品无疑是十分成功的,这为探索中的戏曲改革,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模范,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们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争取创作出更多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优秀作品,赢得群众,占领市场。

(作者单位:山东省艺术研究所)